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9-1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499

Hans汉斯

西方“零工经济”盛行的生成逻辑与劳动形态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陈　佳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2日

摘　要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推动零工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快速扩张，覆盖网约车、外卖配送、平台兼职等领域，成为西方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零工经济表面是灵活就业创新，拓展劳动者就业选择，背后却存在劳动者权益缺失、收入不稳定、剥削隐蔽化等突出矛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发现，西方零工经济兴起并非单纯技术创新结果，而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资本应对积累危机、追逐利润最大化而调整生产与用工模式的产物。本文结合数字马克思主义、平台资本主义相关理论，梳理西方零工经济现实样貌，剖析其生成根源，揭示零工经济本质是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数字化转型，分析其社会影响。既有助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矛盾新特征，也能够为我国规范灵活就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零工经济，资本积累，平台资本主义，劳动异化，劳资关系

A Study on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Labor Forms of the Predominant Western “Gig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Jia Che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6; accepted: October 21,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2, 2026

文章引用: 陈佳. 西方“零工经济”盛行的生成逻辑与劳动形态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9-16.
DOI: 10.12677/acpp.2026.1511499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gig economy has burgeoned prominently in developed Western nations, spanning diverse sectors such as ride-hailing, food delivery, and platform-based part-time work, thereby becoming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Western labor market. While superficially embodying an innovative form of "flexible employment" that offers workers expanded occupational choices, the gig economy is concomitantly fraught with issues including the erosion of labor rights, income instability, and the covert nature of exploi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prevalence of the gig economy in the West is neither incidental nor merely a produ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ather, it constitute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t reflects strategic adjustments in production methods and employment patterns undertaken by capital to address accumulation crises and maximize profit. Grounded in Marxis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incorporating contemporary digital Marxism and platform capitalism theo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proliferation of the Western gig economy to elucidate its deep-rooted causes. It reveals that the gig economy essentially represents a contemporary reconfiguration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Furthermore, the paper explores its implications for Western societies, offering a theoretical lens to comprehend the evolv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capitalism, while providing insights for China to regulate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safeguard labor rights.

Keywords

Gig Economy, Capital Accumulation, Platform Capitalism, Labor Alienation, Labor-Capit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21 世纪以来，伴随数字平台技术普及，零工经济在西方主要国家实现爆发式增长，美国、英国、德国零工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不断抬升。“平台 + 劳动者”的新型用工模式打破传统正规就业框架，被舆论塑造为实现灵活择业、劳资双赢的新模式。但现实矛盾也在同步显现：大量零工劳动者缺少正式劳动合同，难以享有社保、医保、带薪休假等基础劳动福利；劳动报酬由算法主导，收入波动大、整体水平偏低；算法深度介入劳动全过程，劳动者自主性不断弱化；劳资纠纷频繁爆发，劳动者维权阻力重重。现实问题引发西方社会大量抗议运动，也促使我们追问：西方零工经济繁荣背后存在何种结构性动因，它与资本积累逻辑具备怎样的内在关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分析，具备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西方零工经济的相关分析

(一) 西方零工经济的盛行现状

西方零工经济的发展可以从规模、领域、形式三个维度加以观察。规模层面，零工就业人口持续膨胀，深刻重塑劳动力市场结构。美国劳工统计局 2023 年数据显示，美国零工就业人口达 5100 万人，占总就业人口 32%，其中平台型零工劳动者超 2000 万，分布于网约车、外卖等行业；2023 年英国零工就

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 28%，青年群体在零工劳动者中占比超过 40% [1]。行业领域方面，零工经济已经跳出传统服务业边界，延伸到数字服务、创意产业、技术外包、教育培训等知识密集型赛道。传统零工集中在餐饮、家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新型零工依托数字平台，吸纳文案创作、视频剪辑、在线教学、程序开发等脑力劳动，覆盖范围持续拓宽。从劳动形式划分，西方零工经济主要包含三类。第一类是平台型零工，依靠数字平台完成供需匹配，劳动者承接平台发布任务获取酬劳，代表为 Uber 网约车司机、DoorDash 外卖骑手；第二类为自主型零工，不存在平台中介，劳动者自主对接雇主承接短期项目，如自由撰稿人、独立设计师；第三类属于兼职型零工，劳动者保有一份全职正式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零工补充个人收入，例如企业职员承接文案外包[2]。

(二) 西方零工经济的典型特征

对比传统正规就业，零工经济的灵活性背后暗藏剥削逻辑，主要体现四点特征。第一，劳动关系碎片化，劳动者法律身份模糊。多数零工劳动者被平台划定为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平台借此规避社保缴纳、带薪休假、最低工资等法定义务，劳动者缺少就业保障，随时可能被平台淘汰[3]。第二，劳动时间地点看似灵活，算法控制不断强化。劳动者可以自主选择上线时间与工作地点，但任务派发、薪酬核算全部由算法完成，接单率、服务评分被全面量化，达不到算法标准就会被缩减订单甚至封禁账号，劳动实质自主性被大幅消解[4]。第三，剥削趋于隐蔽，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发生改变。零工经济依托平台算法、计件计酬实现“灵活剥削”，剩余价值提取更加隐蔽。第四，权益保障机制缺位，劳资矛盾不断积累。零工劳动者普遍缺少社会保障，工伤、失业、疾病风险缺少兜底；收入受订单量、平台规则、市场行情扰动；平台与劳动者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申诉维权渠道不通畅，劳资冲突频繁发生。

(三) 零工劳动者的内部分层与异质性

零工劳动者并非同质化群体，依据人力资本、收入水平、劳动自主性，可划分为高技能自由职业者与低技能平台劳动者，两类群体劳动处境、议价能力差异显著。

高技能自由职业者包含独立开发者、设计师。这类劳动者人力资本雄厚，市场议价能力较强，借助平台可以获得较高劳动回报，很多人主动选择零工模式，部分人收入高于传统全职岗位。即便如此，该群体同样承受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晋升路径模糊的困境。伴随全球化平台竞争加剧，劳动力跨区域套利不断发展，高技能零工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也逐步遭到侵蚀。低技能平台劳动者主要是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这类岗位技能门槛低，劳动者可替代性强，在劳资博弈中处于弱势。他们大多被动进入零工市场。传统制造业岗位萎缩，正规就业机会收缩，只能依靠零工维持生存。劳动过程被算法严密管控，劳动强度高、薪资微薄，是零工体系下受剥削最深的群体。

但分层不是固化的，两类群体之间存在流动可能性。经济下行周期高技能从业者收入缩水，可能转向低技能零工；部分低技能劳动者通过技能提升实现向上流动。但整体上，零工经济扩张主要催生大量低保障、低技能岗位，放大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5]。

(四) 不同国家零工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

受劳动法律、社会保障制度、监管取向等影响，西方各国零工经济发展路径各不相同。

美国执行宽松监管模式，联邦层面没有统一的零工劳动者身份认定标准，各州对于雇员与独立承包商界定存在分歧。加州 2020 年通过第 22 号提案，把网约车、外卖骑手排除在雇员保护框架之外，仅提供有限健康补贴，宽松监管助推 Uber、DoorDash 快速扩张，但劳动者保障水平低下，缺少工伤、失业保障，收入波动剧烈。而部分欧洲国家采取相对严格监管路径。英国最高法院 2021 年判决 Uber 司机属于“工人”，依法享有最低工资、养老金，判决的核心逻辑在于平台掌握定价、派单，劳动者不具备实质议价权[6]。德国依托《集体劳动法》约束平台用工，工会深度介入零工劳动者权益谈判，该模式下劳动者

权益保障更加完善，劳资冲突相对缓和。

不同国家对比证明，零工经济形态不完全由技术决定，监管制度、劳工力量会深刻塑造行业面貌，宽松监管带来行业快速扩张，但劳动者利益受损；严格监管增长速度放缓，但劳动保障更充分。

3. 不同理论视角分析框架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资本的核心本性是追逐剩余价值，力求获得更多剩余劳动。马克思区分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前者依靠延长工作日，后者依靠提升劳动生产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零工经济中算法管控劳动流程、压低单位任务报酬、倒逼劳动者提速，正是数字时代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新样态。平台不改动法定工作时长，依靠算法推高劳动强度，压缩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积累一般规律指出利润率趋向下降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为减少利润率下滑，资本改造生产组织、压低用工成本、拓宽剥削边界[7]，零工经济就是资本应对利润率下降的产物。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同样具备解释力，《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劳动异化四重维度：劳动者同劳动产品异化、同劳动过程异化、同人类类本质异化、人与人之间异化[8]。在零工场景下，四重异化得到新演绎：劳动者无法占有劳动成果，平台抽取佣金之后劳动者只有少量收益；算法调度全部劳动流程，劳动者丧失对工作过程的主导；劳动不再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仅仅成为谋生手段；评分、派单机制制造劳动者内部竞争，激化人与人之间对立。劳动力商品化理论进一步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前提，零工经济实现劳动力按需调用，劳动力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者全部时间都具备转化为劳动时间的潜在可能，劳动力再生产也被纳入资本积累体系[9]。

(二) 当代数字马克思主义与平台资本主义理论

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时代资本生产与增殖的核心载体，重构了工业资本主义运行范式，在资本积累、价值创造、劳动控制维度形成区别于传统资本的独特机制。它并未颠覆资本主义增殖与剥削的本质逻辑，只是推动剥削向着数字化、隐蔽化、全域化升级[10]。

在资本积累层面，数字平台塑造了垄断化、低成本的新型积累机制。传统工业资本积累受实体生产资料与线下场景限制，存在空间与速度约束。数字平台依托数据基础设施与算法垄断开辟全新积累路径。凭借网络效应快速扩张，以极低边际成本吸纳海量用户与劳动者，突破时空限制，将日常生活与闲暇时间纳入资本增殖空间，实现资本的空间修复；平台形成复合型收益结构，收入融合商业利润、数字垄断租金与数字劳动剩余价值，依靠数据、算法独占攫取超额利润；同时建立无偿化积累模式，平台无需支付报酬即可占有用户浏览、内容创作产生的原始数据，大幅压缩生产成本，形成数字资本低成本、高增速的积累特征[11]。

在价值创造层面，数字平台重塑价值载体、劳动形态与分配关系，构建数字化价值生产机制。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的本源仍是人类活劳动，但平台革新了价值生产的实现形式。价值创造主体不断泛化[12]，突破传统产业工人范畴，形成有偿平台劳动与无偿用户数字劳动双重主体。网络主播、平台零工等有偿劳动直接生产数字服务价值；网民日常数字实践构成隐性无偿劳动，持续生产数据这一核心生产资料，成为数字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价值载体由实物商品转向流量、数据等数字化形态，平台依托算法加工原始数据，将零散劳动成果转化为可交易的数字商品，凭借生产资料垄断掌握分配主导权，占有绝大部分剩余价值，劳动者与用户仅获得有限回报，呈现价值创造社会化、价值占有私人化的分配悖论。

在劳动控制层面，数字平台构建算法化、隐蔽化、全域化的劳动支配机制。不同于传统工厂人工监督式的显性管控，平台依靠算法实现对劳动过程的隐性支配。平台将劳动流程拆解为接单率、时效、服

务评分等量化指标，把具体劳动转化为标准化数据，精准管控劳动强度与时长。算法规则由平台资本设定，依托派单权限、流量奖惩形成刚性约束，倒逼劳动者主动提升劳动强度，实现剥削内化。与此同时，平台模糊劳动与闲暇的边界，将劳动者日常行为纳入数据监控，消解传统劳动时空界限，实现全天候管控，最大限度榨取数字劳动剩余价值[13]。

(三) 其他理论流派分析

对于西方“零工经济”盛行的生成逻辑与劳动形态研究，其他理论流派有不同的看法，这样主要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劳动社会学和主流劳动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数字平台降低供需双方搜寻、匹配、监督成本，平台是市场对企业组织的替代。该理论解释效率层面现象，却遮蔽权力不对等与剥削现实。平台不是中立中介，掌握规则制定与算法权力，劳动者议价权微弱，新制度经济学把劳资关系简化为平等市场交易，掩盖资本支配劳动的实质[14]；劳动社会学聚焦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提出概念与执行分离、去技能化命题。算法管控零工劳动，代表泰勒制管理的数字化升级，任务拆解、量化考核实现比传统工厂更加细密的管控。劳动社会学侧重微观劳动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握宏观资本积累矛盾，二者互补能够完整理解零工经济；主流劳动经济学将零工经济视为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自然结果，将灵活就业解读为劳动者自主偏好带来的帕累托改进。该视角放大个体理性选择，忽略大量劳动者因为正式岗位匮乏被迫进入零工行业，所谓自主选择建立在结构性约束之上。马克思主义分析要求跳出个体选择层面，锚定资本积累的结构性逻辑[15]。

4. 西方零工经济盛行的深层根源

西方零工经济兴起不是技术或者市场自发演化的结果，是资本积累内在矛盾驱动下的历史产物。资本私有制、资本增殖诉求、资本积累矛盾等多重因素交织，共同推动零工经济扩张。

(一) 根源一：资本积累内在矛盾激化，倒逼资本开辟全新积累渠道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陷入滞胀，传统工业化积累遭遇瓶颈。生产力提升带来生产社会化与产能过剩，财富向资本集中，大众购买力相对不足，生产和消费矛盾加剧，资本利润率持续走低。为化解危机，资本需重构生产组织与用工模式。零工经济恰好契合资本诉求。平台不需要投入大量固定资产，压缩固定成本；劳动力供给随市场需求灵活伸缩，规避产能过剩和人力闲置；碎片化劳动形态最大化挖掘剩余价值，拓展资本增殖空间。零工经济是资本面对积累危机开展自我调适的产物[16]。

(二) 根源二：资本增殖逻辑作为根本动力，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

资本的本性是无限追求剩余价值。数字时代平台算法革新剥削手段，零工经济成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新载体。平台依靠算法压低单位任务酬劳，劳动者为获取足够收入被迫延长工时、加大劳动强度；算法智能派单减少劳动空耗，实现按需剥削。同时，独立承包商身份帮助平台免除社保、固定工资等支出，大幅抬升资本利润率。零工经济本质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催生的新式剥削模式[17]。

(三) 根源三：资本私有制根基不变，资本支配劳动的格局延续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根基，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零工经济没有动摇私有制根基，只是变换剥削表现形式。平台资本占有平台这一核心生产资料，劳动者表面拥有工作时间选择权，但薪酬标准、任务分配、平台规则全部由资本决定。劳动者脱离平台订单就难以获得收入，无法修改算法规则，拒绝不合理安排就会被限流封号。看似自由的零工劳动背后，资本支配劳动的底层关系没有改变[18]。

(四) 根源四：市场化放松管制政策，提供制度外部条件

20 世纪 70 年代，放松监管、私有化、削弱工会、削减社会福利成为西方主流政策。这套制度环境为

零工经济提供了便利途径。第一，劳动力市场监管放松，工会力量被削弱，平台得以大规模使用独立承包商身份规避劳动法约束，劳动者缺少集体博弈渠道。第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大量公共岗位转化为短期零工岗位；数字平台在政策鼓励下快速做大，成为零工经济载体。政策话语片面吹捧灵活就业的市场配置功能，回避劳动权益保护，助推零工模式遍地开花[19]。

5. Uber 与 Deliveroo 案例分析

Uber、Deliveroo 两大平台案例可以具象展现算法如何完成资本对劳动的控制。

Uber 作为头部网约车平台，算法从多维度管控司机。一是动态高峰定价，需求上涨时抬升乘客价格，刺激司机上线，平台佣金同步增加。二是任务分配算法，依据位置、评分等派单，司机拒绝订单多会被减少派单甚至冻结账号，缺少选单自主权。三是薪酬计算算法，收入由多重参数构成，司机难看懂计算逻辑；平台设置定额订单发放奖金的任务机制，诱导司机拉长工作时长。四是乘客评分体系，评分直接决定接单权限，迫使司机承受不合理要求[20]；英国外卖平台 Deliveroo 骑手分为有班次保障的全职骑手和没有任何保障的自由骑手。算法控制体现在：配送时间算法，算法测算的送达时间经常低估现实路况，逼迫骑手超速，提升交通事故风险；区域划分机制，骑手被限定在固定片区接单，跨区接单受到限制，平台分区域差异化设置酬劳；全方位数据监控，App 实时采集位置、移动速度，监测骑手在线活跃状态，判定不活跃可能取消订单。

两个案例证明，算法绝非纯粹技术工具，而是资本实施劳动管控、榨取剩余价值的中介。劳动流程被拆解、量化，剥削变得更加高效隐蔽，劳动者处在算法规则之下，反抗空间被极大压缩[21]。

6. 零工经济盛行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零工经济帮助资本短暂缓和积累矛盾，给经济带来短期活力，但同时也带来多重负面社会后果。

(一) 对劳动者的影响：劳动异化加深，权益保障缺失

零工场景下劳动异化进一步深化。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出收益大部分归平台，劳动者只拿到微薄报酬，劳动退化为单纯谋生手段。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相异化：算法统摄全部作业环节，劳动者被动服从指令，劳动创造性被压抑。劳动者同人自身类本质异化：劳动不再服务人的发展，劳动者困在生存劳动循环中，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劳动者现实权益遭受损害，社保、失业保障不足；收入不稳定，部分群体收入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维权成本高，劳资冲突难得到公正解决。劳动者生存压力、心理压力增加，社会归属感弱化，对现有制度的不满持续累积[22]。

(二) 对社会的影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

平台资本依靠佣金与剩余价值攫取巨额财富，零工劳动者收入增长停滞，财富加速向少数平台所有者集聚。西方社会顶层群体财富占比持续走高，中产阶层萎缩，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贫富差距催生大量零工劳动者罢工抗议，争取薪酬与保障；社会焦虑蔓延，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社会撕裂加剧。另外传统工会影响力下滑，劳动者集体行动能力衰减，进一步放大社会矛盾。

(三) 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暂时延缓危机，长期矛盾持续累积

零工经济降低用工成本，提升资本利润率，暂时缓解利润率下降等难题，但零工经济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资本收益膨胀而劳动者收入低迷，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问题持续存在；劳动者权益困境不断积累社会张力；算法驱动的新式剥削，暴露出资本增殖逻辑固有的缺陷。零工经济只是推迟矛盾总爆发，给资本主义社会埋下长期风险，不能克服资本积累的历史局限。

(四) 零工劳动者的反抗策略与能动性

零工劳动者不是完全被动服从算法的客体，发展出多层次抗争方式。一集体罢工行动。英国 Deliveroo

骑手罢工、美国 Uber 司机多地联合抗议，要求提高待遇，部分行动迫使平台小幅让步，但集体行动组织难度大，持续性有限[6]。二司法诉讼挑战独立承包商身份认定。英国 Uber 司机诉讼取得里程碑式判决；美国加州 AB5 法案试图重新界定劳动者身份，虽被 22 号提案推翻，但展现立法层面抗争。三日常微观抵抗“算法游戏”，劳动者多平台同时接单、骑手抱团共享路况信息，虽难以从根本上颠覆算法体系，但争取到部分生存空间。虽然劳动者抗争面临各种阻碍，但各类抗争证明劳动者具备主观能动性，是推动零工经济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

7. 现实启示

西方零工经济的发展实践及其内在机理，为把握当代平台劳动的新特征，以及完善我国灵活就业治理、维护劳动者权益提供有益借鉴。一要辩证认识平台经济下劳动形态的新变化。零工经济是资本运作模式的局部改良，并未消解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应客观认识其发展局限。二要防范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立足我国灵活就业现实，汲取经验教训，规范算法与用工规则，厘清平台和劳动者权责边界，规避资本对劳动的过度压榨。三要健全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劳动相关法规，厘清零工从业者身份认定，补齐社保、医疗等保障短板，畅通维权途径。最后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处理资本和劳动关系，合理规制资本行为，平衡平台发展与劳动者利益，促进就业领域公平正义。

8. 结论

西方零工经济的兴起，是资本应对积累压力、追逐利润而调整生产与用工模式的产物。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平台借助算法形成更为隐蔽的劳动榨取方式，私有制、资本增殖诉求以及市场化放松管制共同助推零工经济快速扩张。零工经济只是改变资本作用于劳动的具体形式，没有改变资本支配劳动的现实。它虽在短期内缓和资本积累压力，却无法消解其内在冲突，资本逐利诉求和劳动者权益、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会持续给平台主导的发展模式带来风险。

参考文献

[1] Dame, J. (2016) How the Gig Economy Can Fit Your Business. *Central Penn Business Journal*, **32**, 14-17.

[2] 林嘉琳, 陈昌凤. 算法决策下零工经济平台的权力关系变动及价值选择——以外卖平台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12): 153-157.

[3] 王鹏飞. 平台经济下零工劳动者保护的规范危机与劳动关系认定[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6): 103-111.

[4] 刘善仕, 裴嘉良, 葛淳棉, 等. 在线劳动平台算法管理: 理论探索与研究展望[J]. 管理世界, 2022, 38(2): 225-239+14-16.

[5] 彭晓艳, 岳经纶, 年鹏翔, 等. 在线劳动平台全景监控下数字零工的矛盾体验与权力博弈[J]. 财经论丛, 2026, 42(5): 113-124.

[6] Lobel, O. (2017) The GIG economy &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Law.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Law Review*, **51**, 51-73.

[7]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 胡钧, 张洁洁, 韩保庆. 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视角下的平台经济发展研究[J]. 经济纵横, 2022(2): 19-26+2.

[10] 刘庆龄, 王蒲生. 平台资本主义下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批判——以零工经济为例[J]. 经济问题, 2026(2): 10-18.

[11] 余晖, 钱贵明. 平台经济垄断: 基本表征、理论解释与管制治理[J]. 江海学刊, 2021(2): 98-104+254.

[12] 罗光强, 宋新宇. 价值共创数商模式的理论解释与经验检验——兼论平台经济的演化[J]. 中国流通经济, 2026, 40(1): 70-83.

[13] 魏海涛. 平台经济背景下的劳动过程理论: 挑战与新议程[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2): 199-210.

[14] 陆茸, 汪青. 国外平台经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两种理论路径探析[J]. 当代经济研究, 2022(5): 69-78.

[15] 郭彤梅, 苗梓欣, 郭秋云, 等. 零工经济的研究述评与展望[J]. 管理学报, 2023, 20(6): 936-946.

[16] 刘洋, 李浩源. 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现实表征及其批判[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5(4): 146-152.

[17] 高岭, 唐瑜, 林传学. 平台经济劳动过程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审视——回到马克思的劳资合作理论[J]. 中国经济问题, 2024(4): 33-47.

[18] 王娜. 平台资本主义的技术哲学透视[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2): 11-17.

[19] 乔韵, 叶明. 平台经济监管的常态化: 内在逻辑、理论范式与实践策略[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4): 152-160.

[20] 魏巍, 刘贝妮. 算法管理能提高数字零工劳动者的平台承诺吗?——“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的双刃剑效应[J]. 经济管理, 2023, 45(4): 116-132.

[21] 郭彤梅, 郭秋云. 算法控制、表面顺从与零工工作者服务绩效: 压力感知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24, 36(11): 194-205.

[22] 潘旦. 互联网“零工经济”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4): 89-95+159.